

另外，書中有兩點是值得作者再多加討論的。首先，作者指出推動成都改革者進行革新的，是日本「文明開化」的概念。不容否認，日本為當時中國的改革者提供了具體的改革藍本，作者在書中亦提出了不少資料作論証。但從清末到民國，實際推動革新的動力，是源於由達爾文提出、而由嚴復引入的「進化」理論。由於這種直線歷史發展的思考模式，令改革者認為傳統文化有礙「進化」，因而要急切進行改革。作者若能對當時推動革新的思潮作較細緻的分析，可以令讀者對改革的背景有更深入的了解。

其次，作者錯過了許多可以進一步作深入討論的地方。例如作者提到由於警察制度的引入，不少地方的廟宇成為警察分局，其中一所廟宇為財神廟。1909年，當地人向當局表示希望警局能暫時遷出，讓他們舉行神誕，當局斷然拒絕，指對公眾來說，警政應比神誕重要（頁148）。作者並沒有進一步分析這件可充分反映民間與施政者的觀念衝突的事件。由於放棄對這類事件的考察，清末的警政在作者筆下成為得到當地人民廣泛支持讚賞的措施。另一個例子是成都的「花卉節」。作者指這個「花卉節」在民國以前已是成都重要的社區活動之一，在清末開始則隨著政府對工商業發展的重視，慢慢演變成宣傳工商業的「商業勸工會」（頁22，140）。這是非常有趣的事例，可以反映民眾的活動如何隨著「城市改革」而變化，可惜作者對此活動著墨甚少。另外，若作者能分析在清朝時期的「花卉節」(Annual Flower Festival)主辦者，或可幫助解答上文提到的成都「地方精英」的構成問題。這兩點亦反映了作者對施政者的興趣，遠高於這些政策下的社區活動的變化。

總括而言，此著作的貢獻在於展現成都這個內陸城市，自清末到1930年代改革政策的發展脈絡，當中以警察制度有較深刻的分析。讀者亦可從中了解到兩次改革浪潮在重點上的差異。但若希望了解改革下成都民眾生活的變化，此書則未能令人滿意。

潘淑華
香港科技大學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y PAMELA KYLE CROSSLE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002. xiv, 403pp.**

本書不少篇幅是分析乾隆時期(1736-1795)，清王朝如何透過身份的界定，來統治多元文化組成的大清帝國。柯嬌燕(Pamela Crossley)指出，乾隆皇帝所代表

的，是清帝國下每個文化至高無上的代表。他是愛新覺羅氏，也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後人，是滿州人的當然皇帝；面對漢士大夫，他倡鄭玄而抑朱熹，將自己提昇至「聖王」的地位。至於管治西藏和蒙古地區的合法性，乾隆皇帝是從先祖繼承得來的。西藏地區一直受許多外來宗教影響，但自九世紀開始，來自印度的佛教逐漸流行。元朝建立，主流教派紅教更與元世祖忽必烈合作，忽必烈保護紅教而得到後者尊為「轉輪王」(Cakravartin)，成為佛教世界的合理統治者。同樣重要的是，由於轉輪王是轉世再生，忽必烈因而可以透過確認成吉思汗是前世轉輪王，從而繼承成吉思汗在蒙古和中亞的權威。不過，自 16 世紀開始，紅教在西藏的勢力被新興教派黃教所取代，其中達賴喇嘛地位尤其崇高，無論在西藏和蒙古部份地區均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清入關後，順治皇帝透過與達賴喇嘛建立學生與老師的關係，獲得了在西藏和蒙古地區管治的合法性。但這還未足夠，紅教在西藏雖失勢，在蒙古很多地區，特別是那些相信自稱是成吉思汗子孫的部落中，仍有很大的影響力。例如在明末，與明朝有協約共同抵禦後金的察哈爾部，就是以成吉思汗後裔自居，而首領林丹汗，便是公認的「轉輪王」。1632 年，皇太極親率軍隊攻打察哈爾部，林丹汗敗遁，逃至青海。1634 年，林丹汗病死於青海。1635 年，皇太極再派遣多爾袞攻打察哈爾部，消滅林丹汗殘部，俘虜了林丹汗的正妃和兒子，由此得到代表元朝正統的傳國寶。1636 年，蒙古 16 部在盛京召開大會，共尊皇太極為可汗，皇太極自此代替林丹汗，成為「轉輪王」，取得對蒙古地區統治的合法性。這種身份，也於 18 世紀被乾隆皇帝繼承。

以上的分析，頗具啟發性。多年以來，中國歷史學家普遍認為，清帝國的維持，乃是得力於清室的漢化，但上述柯嬌燕的意見，無疑駁斥了這個論點。事實上，伊芙琳·羅斯基(Evelyn S. Rawski)早在 1996 年已質疑何炳棣的漢化理論，而何氏則於其後作出反駁，兩人的觀點見於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 4 (1996):829-50; 57.1 (1998):123-55。柯嬌燕是書的出版，可視為是這場辯論的延續。無論結果是怎樣，本書的見解擴闊了我們的眼界，至少令我們開始意識到，清帝國所面對的統治合法性問題，不單存在於前朝的漢人社會，還有蒙古、西藏、青海和新疆地區。

本書要探討的另一個問題是「身份認同」(Identity)。身份認同是一種身份認知的過程，在這認知的過程中，存在著被界定和自我界定的社會行為。劉志偉在其有關明代戶口和稅收的研究中，曾精闢地指出明初政府的「編戶齊民」，雖然使廣東大部份的「土人」，從此成為王朝下的「民」，但因種種緣故沒有登記在政府戶籍內的「無籍」者仍然不少。這些「無籍」之人，在明王朝和許

多人的眼中，是「化外」的「蠻夷」。於是，明初的戶口登記，由王朝子民身份的賦予，創造出文化的標籤【見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役制度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有趣的問題會是，當曾被明政府標籤的「蠻夷」，成為新的征服者，他們對自己、對他人的身份認同的轉變會是怎樣？本書在分析清帝國建立的同時，亦同時解構這個問題。在解構的過程中，對滿人和遼東漢人的探討尤其詳盡。

柯嬌燕認為，滿州人的身份，是1636年才建構出來的。當時皇太極稱帝，將國號由「金」改為「清」的同時，下令女真國人，一律改稱「滿人」。皇太極此舉，使國人區別於帝國外的女真人（特別是黑龍江地區的野人女真），但是「滿人」這個新的身份，因而被建構出來。簡單來說，滿人是已編入「滿州八旗」的女真人。

滿人身份雖在17世紀被建構出來，到20世紀卻發展成為一個民族，柯嬌燕指出，中間是經過許多人工化的過程的。例如1637年，皇太極下令成立的「國史館」，編成了有關努爾哈赤的《武皇帝實錄》。書中的開首以佛庫倫仙女吞朱果而生布庫里雍順的神話故事，帶出長白山和黑龍江乃滿人的歷史地理發源地（頁196-205）。1669年，康熙皇帝更派人訪長白山，找尋祖先故蹟，以便在清、朝鮮和俄國間決定邊界，傳說由是得到實地的考證。事實上，由康熙皇帝開始，滿人愈來愈相信「滿」有著共同的祖先。這種思想，使滿人積極地將自己的家族，與遠古居住在長白山、黑龍江一帶的人，包括12世紀金朝下的女真人，結成一脈相承的關係，族譜由是流行。1745年，乾隆皇帝下旨編修的《八旗滿州氏族通譜》，便是確立以氏族為中心的滿州文化。1783年，《滿州源流考》編成，提供了滿州氏族和金朝氏族的對照表。乾隆皇帝甚至相信，滿人的身體特徵是與別不同的，特別是後腦比較平扁。

有趣的是，當滿州人逐漸被建構成一個民族，遼東人卻慢慢喪失了他們的獨特身份。1616年以後，努爾哈赤確立了八旗戶口制度，當時他統治下的女真人，被編入了八旗，但是女真人的定義，是文化而非血統。正因如此，世居遼東撫順的大姓佟氏，雖然祖先是女真，但由於漢化，並沒有被編入八旗。在當時，佟氏被編入了八旗的附屬部隊「烏真超哈」裏面，出征時以黑旗代表。有學者將「烏真超哈」理解為重炮兵部隊，但柯嬌燕認為應翻譯為「愛將」（cherished soldiers）。皇太極時期，這些所謂「愛將」的身份逐漸被認同為一種特定的文化群體。1642年，皇太極將八旗制度重新規劃，定立「滿州八旗」、「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撫順佟氏也於此時被編入「漢軍八旗」裏面。這個分類，使關外遼東地區既非女真，也非蒙古的人，獲得一個較清晰的身份。

但是，「八旗漢軍」不是「漢」，在1644年順治皇帝入關後，朝廷並沒有將八旗漢軍等同新投降的漢人，所以新投降的漢兵，只被編入「綠營」。不過，以後的發展，對「漢軍八旗」的身份發展非常不利。1688年，佟國綱向康熙皇帝請求將撫順佟氏由漢軍正藍旗，改隸滿州旗下。他所持的理由是撫順佟氏祖籍是佟佳(今吉林省)，是滿人早期的聚居地。柯嬌燕認為佟國綱將撫順佟氏塑源於佟佳是杜撰的，目的是擺脫漢軍八旗的身份，這在以漢軍八旗為主的三藩之亂剛剛結束之時，尤其迫切。不過，雖然是杜撰，佟氏的申請最終得到康熙皇帝的應允，從此成為滿州人。之後，陸續有許多遼東宗族以祖譜舉證，轉入滿州旗下。1740年，乾隆皇帝更公開表明，所有八旗漢軍本質上均是漢人，將仍留在漢軍八旗的人「出旗為民」，漢軍八旗的身份由是取消。至此，滿和非滿的分別，已由文化轉由血統決定。

從上述的綜合可以發現，本書無論對清帝國的形，以及帝國下不同身份的建構，均有獨創性的見解。值得強調的是，柯嬌燕的努力，不僅在於她運用了許多滿文資料，更重要的是，她對資料的運用是很小心的。例如，她對於古老資料，並沒有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史實，在使用資料的同時，她特別注意到時代思潮與資料加插的關係。正因這種嚴謹的態度，使本書不落於俗套。

張瑞威
香港城市大學

方李莉，《傳統與變遷：景德鎮新舊民窯業田野考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8, 8, 438頁。

景德鎮城市經濟史專家梁淼泰指出，景德鎮是世界上歷史最久的一座單一手工業城市，其製瓷技術馳名中外。即使歷經現代化工業經濟的衝擊，景德鎮仍然維持著歷史最久的單一手工業城市的本色，20世紀80、90年代景德鎮興起的民窯業讓人又一次看到了「傳統」的復興和巨大魅力。方李莉所著《傳統與變遷：景德鎮新舊民窯業田野考察》(以下簡稱《傳統與變遷》)一書嘗試通過解讀景德鎮民窯業的歷史和現實來反思景德鎮民窯業的傳統及其在現代化中的重構。

方李莉是景德鎮人士，曾經在景德鎮陶瓷學院獲得碩士學位，後到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曾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進行博士後研究，《傳統與變遷》一書就是其在博士後出站報告基礎上改寫而成。此書共包括三篇文章和結語：第一篇題為〈傳統在現代化中的重構〉，主要是考察